

張力與限界

★ 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

Tension and Limits

R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1933—1934

黃道炫 著

目 錄

引子 歷史的彈性.....	001
一 中央蘇區的煉成.....	007
1. 中央蘇區的成長	007
2. 新形勢與新任務	019
3. 從毛澤東眼中走進蘇區	029
4. 國共較量中的地緣政治	095
二 燃燒的革命.....	110
1. 中央蘇區的黨	110
2. 中央蘇區的政權	130
3. 宣傳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	155
4. 社會革命的宣傳與實踐	165
5. 婦女：地位上升最快群體	179
6. 群眾：組織與改造	196
7. 紅軍：堡壘的堅強核心	209
三 第五次「圍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	219
1. 國民黨軍的作戰準備和作戰方針	219
2. 國民黨軍作戰基礎的增進	233
3. 國民黨軍的作戰部署	239
4. 「七分政治」的具體實施	243

四	第五次反「圍剿」：中共絕境求生	267
	1. 中共的反「圍剿」準備和作戰方針.....	267
	2. 「短促突擊」戰術	282
	3. 紅軍的正規化建設和防禦原則	294
五	消耗戰中的資源陷阱.....	303
	1. 結構性的限制——中央蘇區的人力與物力	303
	2. 經濟力的挖掘	327
	3. 財政緊張下的民眾負擔	345
	4. 查田運動：理念、策略與現實	358
六	內外擠迫下的社會政治困境.....	375
	1. 肅反問題	375
	2. 工作作風問題的滋生	388
	3. 群眾逃跑	395
	4. 擴紅與開小差	403
	5. 「赤白對立」	416
七	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	432
	1. 運動與攻堅	432
	2. 福建事變爆發與國共的應對	463
	3. 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爭奪	500
	4. 紅軍戰略轉移的準備	537
	5. 紅軍實施轉移	565
結語	革命的張力.....	589
附	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經過要圖·廣昌戰役	592
後記	593

引子 歷史的彈性

1933年秋國共的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開始時，位於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正處於全盛時期。雖然在此之前長江流域與中央蘇區可以形成犄角之勢的幾個大的蘇區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經相繼被國民黨軍佔領，但當時仍然不會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後的秋天，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蘇維埃區域就會在國民黨軍強大壓力下，隨着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而易手。失敗的結局使中共不得不上長途跋涉之路，尋找繼續生存、發展的機會，突圍中的艱難也導致了中共在奪取政權前最重要的一次領導層變換。同樣讓人很難預想到的是，經歷了如此慘痛的挫折，在對手看起來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陝北站住腳跟；而且這次失敗實際上就是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前最後的一次戰略性失敗，從此中共的革命奪取政權之路大有直濟滄海之勢。

失敗總不是件讓人愉快的事，與中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進程的描述相比，對於中共歷史上這樣一次重要的失敗經歷，具體的研究和闡述不是很多，有許多問題我們尚不能得其詳，簡單的原則論述和具體的歷史運行脈絡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而當我們重複當年更多的是基於政治考慮的結論，以「左」的錯誤為這次失敗定性時，往往忽視了其中包含的歷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

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後面，被斷送的可能是一個個正在具體影響着社會歷史的細節，歷史離開了細節，總讓人想到博物館那一具具人體骨骼，的確，那是人，但那真的還是人嗎？

其實，翻開中共壯麗歷史的長卷，在欣賞波瀾壯闊的勝利畫面之餘，偶爾體味一下這一段別樣的經歷，也許可以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如果考慮到成敗、禍福之變，誰又能說，這樣的失敗就完全沒有意義呢？！就整個蘇維埃運動而言，後人（雖然是外國人）曾有過中肯的評斷：「儘管蘇維埃運動遭到失敗，但是政治、軍事和社會經濟活動的經驗以及經受過組織和動員蘇區居民的各種方式的嘗試和失敗的考驗，使得中共到 30 年代中期成了東方各國共產黨中唯一擁有實際上執政黨經驗的黨，擁有絕無僅有的農村工作經驗以及軍政骨幹的黨。這（加上其他條件）也成為抗日戰爭年代裏黨員人數和武裝力量較快增長和發展的基礎。」^① 這樣的說法放到第五次反「圍剿」的這一時段中，也並非就沒有針對性。蘇維埃運動是中共革命過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階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從不可能到可能的創造奇跡的過程，因此所謂的超越階段之類的說法更多只具有邏輯上的意義。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過對蘇區的獨立控制，顯現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動員能力和控制藝術。事實上，雖然具體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此後續有調整，但中共革命

①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7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第 20—21 頁。

的幾個重要原則諸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土地革命、社會再造等，在這一時期已經牢固確立，由蘇維埃革命開始，中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革命建國的道路。

蘇維埃革命高歌猛進的初期階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1927年國共分裂時，中共幾乎是白手起家開始武裝反抗，僅僅數年後幾十萬人的武裝即轟然挺立，締造出國共合作共同北伐後的又一個傳奇。中共在這其中表現出的讓人感覺無窮無盡的能量，不僅當年的對手為之震驚，即連多年後的覽史者，也很難不為之傾倒。不過，神話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暫時畫下了一個逗號，再強的張力也有自己的極限，中共在多種境遇下實現的超常發展，到這時，似乎終於到了該停歇一下的時候了。從歷史的大勢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領導固然不能辭其咎，但這些被歷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輕人，其實本身也是歷史的祭品。無論和共產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後人相比，他們改變了的或者可以改變的東西實屬有限，在滾滾的歷史大潮面前，他們難以擔當引領潮流的重任，更多時候乃是隨波逐流。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的航向。後人從他們身上看到的許多問題，既不一定是他們的造作，也不一定為他們所獨有。對此，毛澤東曾在中共內部會議上中肯談道：

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

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①

毛澤東的評判，主要是從中共內部着眼，而鄧小平則從國共相爭的大背景，透視過當年「圍剿」與反「圍剿」成敗得失的幕後玄機：

如果有同志參加過十年蘇維埃時期的內戰，就會懂得這一點。那時不管在中央蘇區，還是鄂豫皖蘇區或湘鄂西蘇區，都是處於敵人四面包圍中作戰。敵人的方針就是要扭在蘇區邊沿和蘇區裏面打，盡情地消耗我蘇區的人力、物力、財力，使我們陷於枯竭，即使取得軍事上若干勝利，也不能持久。^②

中共兩位超重量級人物的論斷，客觀、公正、獨具慧眼，為我們提供了歷史多樣性認識的範本。

如果不是過分執着於結果的話，面對 1933—1934 年蘇維埃革命的歷史進程，冷靜地想一想，中共在贛南、閩西這樣一個狹小地

① 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 938—939 頁。

② 鄧小平：《躍進中原的政治形勢與今後的政治策略》，《鄧小平文選》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 97 頁。鄧小平接下來還談道：「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針，由內線轉到外線，將敵人拖出蘇區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樣蘇區還是能夠保持，紅軍也不致被迫長征。可惜『左』傾機會主義者不這樣做，中了蔣介石的計。」

區內，依靠極為有限的人力、物質資源，在國民黨軍志在必得、幾傾全力的進攻下，竟然能夠堅持一年之久，最後又從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夠令人驚歎的。何況，無論是事後諸葛的我輩，還是當年那些參與創造歷史的人們，只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熱，對於此時國際國內背景下，紅軍在國民黨統治中心區江南的可能命運，應該都或多或少會有不那麼樂觀的預判。中共和紅軍的成長，如毛澤東當年論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着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和統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仔細排列一下當時各蘇區的名稱，諸如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湘鄂西、鄂豫陝、川陝等，就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所有這些蘇區都位於數省交界的邊區，都利用着南京政府控制軟弱的條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絕對不能低估。然而，這一切，到 1930 年代中期，已在悄悄發生着變化。隨着地方實力派挑戰的相繼被擊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斷強化，對全國的控制力逐漸加強，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顯弱化，迴旋空間被大大壓縮。當國民黨軍大軍壓境、全力擠迫、志在必得時，成長中的中共最好的命運大概也就只能是順利擺脫，韜光養晦，以求東山再起了。

這是一個中共成長壯大的時代，但遠不是中共掌握政權的時代，超常的能量，也無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蘇區的發展，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毛澤東、朱德發揮自己的天才劍走偏鋒（比如在軍事上的天才創造、對力量的精準把握）的結果，從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陝，或許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劍走偏鋒。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坐下來，平心靜氣，不抱成見，盡可能避

開歷史進程中現實需要帶來的政治口水，更多通過當年的而不是後來的，描述性的而不是價值評判的歷史資料，回首這一段曾經不那麼願意直面的歷史。歷史展現雖然不會像文學作品那樣羅曼蒂克、激動人心，但卻可能更有益於後人了解歷史的本然進程，以從中汲取養分、獲得智慧。實際上，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思考，面對着他們自己的問題，別人很難越俎代庖，因此，作為一個以國共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為聚焦點的研究，本書或許承擔不起總結經驗的責任，也未必真的能夠提供若干教訓，更多的只是想呈現一種面對歷史的方式，即盡可能不在預設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對原初的過程。儘管，原初的歷史是如此複雜，複雜得也許會讓人感覺混亂，但光怪陸離既然提供給了世界，應該也就預備給了歷史。

平心而論，即便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們也未必能洞察秋毫，何況那已經永遠逝去的人和事，因此，原初的歷史和我們的認知之間，恐怕總是會存在距離，所謂歷史的彈性大概就是由此而來吧。在無限豐富的可能面前，歷史研究者沒有理由不謹慎和謙卑以對。當然，這絕不意味着放棄對歷史本真的探求，在不確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確定的唯一，是歷史研究者無法逃避的宿命，否則，我們因何而存？！

一 中央蘇區的煉成

1. 中央蘇區的成長

1930年代，中央蘇區成為全國各蘇區中的「中央」，絕非浪得虛名。由於朱毛紅軍在贛南一帶的出色表現，早在1930年前後，這裏已經成為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道路問題討論的重心。1930年7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信中共中央，將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問題作為開展農村武裝鬥爭的必要條件，強調：「完全掌握農民武裝鬥爭的一切形式，尤其是直接着手組建惟一能保證我們鞏固勝利的正規部隊，只有在牢牢佔領並保持具有鞏固和進一步擴大蘇維埃政權的足夠政治經濟前提的根據地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同時指出：「我們越是迅速地具有這樣的根據地，越是迅速到把武裝鬥爭從各種獨特的游擊戰變為正規軍作戰形式，我們就越能迅速地保證從組織上掌握農民革命運動，就越能迅速地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從而保證革命的勝利。」^① 根據這一判斷，8月8日，共產國際再電中共中央，進一步指出：

①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紅軍建設和游擊運動問題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第241—242頁。

必須選擇和開闢能保證組建和加強這種軍隊的根據地。對根據地的基本要求是：相當程度是農民運動，從容組建的可能性，獲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證今後能奪取一個有足夠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發展前景。目前顯然贛南、閩南、粵東北地區首先能夠成為這樣的根據地。^①

這裏提到的三個地區此時只有贛南地區已經有大規模的紅軍活動，而先後在這一地區活動過的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的部隊，正是中共武裝的精英。當時共產國際代表判斷，在所有紅軍部隊中，「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3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6軍），與他們差別不大」。^② 中共中央也明確肯定：「四軍是中國紅軍主力的主力」。^③ 顯然，已有根據地基礎，又擁有優良紅軍和堅強領導人的贛南更有可能滿足共產國際建立中心根據地的要求。不過考慮到自己遠在千里之外，畢竟對當地情況不太熟悉，共產國際並不想在這樣的具體問題上遽下定論，在有關電報後面不忘補充說：「更詳細地核實這一情況只能在當地進行」。^④

①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30年8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冊，第278頁。

② 《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冊，第412頁。

③ 《中共中央特派員涂震農報告紀要（1930年6月）》，油印本。

④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30年8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冊，第278頁。

這是 1927 年莫斯科在中國遭遇挫敗後，指導方式開始調整的一個例證。

共產國際提出這一計劃，正是此時實際控制中共中央的李立三錯誤向着最為極端的方向發展之時，某種程度上，這本身就是為着減消李立三的錯誤而提出的。因此，在被狂熱中的中共中央冷藏了近一個月後，隨着進攻長沙的失敗及李立三總暴動方針的破產，尤其是 1930 年 9 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共產國際這一指示開始得到更多重視。首先是關於建立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得到落實。6、7 月間，共產國際數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蘇區「成立有權威的中央局，採取一切措施盡可能加強紅軍」，^①但正沉浸在革命高潮美好想像中的中共中央當時對此無暇顧及。周恩來同年底談道，這時期的中共中央「對於蘇維埃區域的工作，並不放在黨的工作之第一位……同時反對我在國際提出的建立根據地的意見，認為是右傾，保守觀念。六月間，國際來電提出建立蘇區的中央政府，也未被重視」。^②8 月底，李立三的狂熱漸現退潮之勢後，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總行委主席團會議上提出成立蘇區中央局的建議。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最終確定了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名單。同時，周恩來「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蘇區的建議」，由於大家都認為「他在政治局裏簡直是改進黨的工作和改

①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0 年 6 月 19 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9 冊，第 175 頁。

② 《少山（周恩來）同志關於反立三路線問題在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上的報告（1930 年 12 月 1 日）》，抄件。

造黨不可替代的人物」，^① 這一提議未能通過，但體現了此時中共中央開始高度重視蘇區建設。接着，中共中央初步明確了中央根據地的範圍，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於蘇區的工作計劃中談道：「我們現在確定湘鄂贛聯接到贛西南為一大區域，要鞏固和發展它成為蘇區的中央根據地。環繞着它的首先是贛東北與湘鄂邊兩個蘇區根據地，再則，鄂東北與閩粵贛兩個蘇區也很重要。」^② 決定：「在中央蘇區立即設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導整個蘇維埃區域之黨的組織，同時，並在蘇區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以統一各蘇區的軍事指揮。」^③ 這是我們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中央蘇區這一概念。此後，隨着形勢的發展，文件中提到的贛南和閩粵贛（即閩西）兩塊根據地實際成為中央蘇區的組成部分。1931年2月，共產國際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據地」^④ 的提法，3月，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報告中出現「朱[德]—毛[澤東]的中央(蘇)區」^⑤ 這一概念，中央蘇區的地位已經初步奠定。

贛南及贛西南蘇區受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當然和這裏卓有成效的蘇區建設密不可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

①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冊，第396頁。

② 《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429頁。

③ 《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431頁。

④ 《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0冊，第56頁。

⑤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1年3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0冊，第200頁。

等軍政領導人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隨着蘇維埃區域的持續壯大，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關注不斷加強，這裏作為全國蘇維埃中心的地位也更加鞏固。1931年1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此，贛南、閩西作為中央蘇區的地位終於實至名歸。

隨着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日益重視根據地建設，一大批軍政領導人陸續進入中央蘇區，中央蘇區更是人員流向的重點。1930年9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向中央蘇區派出67人，其中57人到達。^①蘇區中央局也正式在中央蘇區開始運行。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1932年下半年，共產國際東方地區書記處鑒於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難以立足，建議將中共中央遷往中央蘇區。^②11月，王明致信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式

①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1年6月10日）》，《共產國際、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0冊，第323頁。

② 關於這一時期中共中央的名稱，有關論著多採用「臨時中央」的提法，嚴格說，這一名稱並不準確。由於中共不能公開活動等多種原因，自1928年六大後，中共黨的代表大會未按期舉行，六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一直延續到1945年七大。沒有證據表明，這一時期，六大的中央委員會曾經在領導體系上發生動搖，「臨時中央」的說法不能獲得合理的根據。現在通常所謂「臨時中央」，實際是指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由於中共中央機關被破獲，向忠發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緊急改組，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應該指出，臨時中央政治局只是相對中央領導機構而言，不能放大到中共中央這一概念，沒有任何資料顯示，當時中共中央使用過「臨時中央」這一提法。而且，即就臨時中央政治局而言，其組成後報請共產國際批准，1931年11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批准中共關於臨時中央局組成人員的提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192（B）號記錄（1931年11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中共黨史出

提出「將中央遷往中央蘇區」。^① 年底，共產國際決定：「採納王明同志的建議，將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和赤色工會總理事會從上海遷往蘇區。」^② 1933年初，中共中央遷往中央蘇區，中央蘇區成為中共中央的指揮中心。

大批領導人進入中央蘇區，一時間使這裏人才濟濟，並使蘇區原有的組織體系發生巨大變化。雖然共產國際對毛澤東、朱德等蘇區創建者予以高度評價，指示「對於毛澤東，必須採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態度和施行同志式的影響，為他提供充分的機會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擔任負責工作」。^③ 中共中央則強調：「我們堅主

(接上頁) 版社，2007，第65頁) 在當時狀況下，這意味着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合法化，所以此後共產國際文件不再使用臨時中央政治局，而是直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參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204(B)號決議(1931年12月2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83頁) 對此，博古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曾提到，自己「始終沒有臨時中央及交出的觀念」。(轉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2頁) 盛岳也回憶：「在它管事期間沒有人把它當成臨時機構，它也沒有用臨時中央名義下發文件。大家都把它當成中央，它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共產國際也確實承認它是中央。」(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第271頁)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舉行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四中全會後組成的政治局完成其歷史使命。

- ① 《王明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32年11月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253頁。
- 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第284號記錄(1932年12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253頁。
- ③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3月19—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54頁。

採取一切方法，根據黨的路線，縮小爭論；無嚴重破壞紀律之事，則絕不應採取任何組織結論。」^①而像周恩來這樣的新領導人對毛澤東也相當尊重，1932年6月，他向中共中央報告：「毛澤東身體極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區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隊一起活動，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②但是一批黨內現有地位高於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到來，使毛澤東不再可能像從前那樣成為蘇區事實上的掌控者，而越來越被有意無意地置於邊緣位置。尤其當中共中央把毛澤東視作右傾方針的代表時，不僅是他本人，他的工作作風、思想方式、應對辦法都遭到質疑，與其有關的一批富有實際經驗的蘇區原有幹部也被冷落甚而被鬥爭，這對蘇區長遠建設、發展並不有利。

歷史運行真是十分複雜，正因為毛澤東、朱德等的出色表現，使贛南、閩西蘇區成為中共活動的中心，而這種中心的到來，卻又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毛澤東等在蘇區的權威。對於毛澤東而言，確實難免會有情何以堪的感覺。當然，也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共中央就是摘桃派，中共中央實際上的接管中央蘇區，首先是由中共嚴格的組織紀律所決定，在這方面，個人或團體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其次，各個蘇區的發展固然包含着領導人的天才創造，但畢竟是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之下，與中共中央的指導和幫助不能分開；另外，中共中央到來前，中央蘇區在肅 AB 團等問題上犯下嚴重錯誤，領導威信其實已經受到影響，黃克誠回憶其與紅軍幹部何篤才

① 《任弼時年譜》，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第196頁。

② 《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6月1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166頁。

間的一段經歷，頗值參考：

何篤才是有功的幹部之一。但由於他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的爭論當中，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甚麼要站到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甚麼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待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對何篤才的這番話，我是在一年以後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其所以會如此，蘇區的同志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①

^①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101頁。

除了新中央與老幹部之間的衝突外，中共中央到來後，即就活躍於第一線的領導人而言，當時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也遠未形成，領導者之間、前方與後方之間的掣肘現象常有發生。周恩來在指揮第四次反「圍剿」時就抱怨：「關於行動部署，尤其是許多關聯到戰術上問題的部署，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活動以機斷餘地和應有的職權，否則命令我們攻擊某城而非以訓令指示方針，則我們處在情況變化或不利的條件下，使負責者非常困難處置。」^① 即使是被認為同處留蘇陣營的張聞天和博古，暗中也不是沒有相互角力，張聞天後來曾談到他和博古此一時期的分歧，認為：「他曾經寫了一篇文章《關於蘇維埃的經濟政策》，暗中的是駁我的個別意見的。」^② 廣昌戰役後，圍繞着戰役方針問題，中共中央內部也有爭論。張聞天回憶，廣昌戰役後的一次會議上，他曾提出質疑：「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拚，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指博古——引者註）批評我，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 1905 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污衊，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③ 楊尚昆後來也談到了這場爭論，他回憶的會議結果是「恩來同志當場調停，宣佈散會」。^④

當然，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這些問題還不明顯，而且

①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 255 頁。

② 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第 76—77 頁。

③ 同上書，第 77 頁。

④ 《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 95 頁。

蘇區正處於其發展的高峰期。1933 年的第四次反「圍剿」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首次在紅軍中運用大兵團伏擊戰法，取得重大勝利，毛澤東也不吝美言，讚譽其為「空前光榮偉大勝利」。^①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國民黨軍在江西處於守勢，紅軍乘機在贛中、贛東北一帶積極活動，擴大蘇區範圍，中央蘇區疆域進一步擴大，跨有閩贛兩省數十個縣。到第五次反「圍剿」前夕，中央蘇區在江西達到極盛，除佔據贛南一半以上地域外，北延到南城、黎川地區，面積在 4 萬平方公里左右。

隨着中央蘇區的不斷壯大，人才空前集聚並擁有了中共中央機關的中央蘇區領導層當然不是毫無作為。七大的建軍報告初稿中曾寫道：「事實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東西一個發展的過程，是在不斷克服困難和錯誤之中把自己堅強起來，我們更應該堅持這種服從真理追求真理的正確態度。」^② 這一判斷在蘇區時期其實同樣適應。也就是說，雖然毛澤東在蘇區發展壯大中表現的卓越才能超乎於包括博古在內的中共中央許多人之上，但不能認為蘇區建設就一定會由於毛澤東地位的變化而升降。中共中央進入蘇區後取得了一些值得列舉的政績：1933 年，在連續兩年歉收後，中央蘇區迎來了蘇維埃政府建立後的第一個豐收年，產量接近革命前的水平，毛澤東 1933 年對才溪鄉的調查展示的雖是比較好的狀況，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暴動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產低落約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

① 毛澤東：《新形勢與新任務》，《紅色中華》第 97 期，1933 年 7 月 29 日。

② 《在七大的建軍報告（初稿）》，1945 年 3 月 1 日。

年恢復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雜糧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則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過了暴動前百分之十。暴動後全區荒了許多田，去年開發了一小部分。今年大開，開了一千三百多擔。」^① 雖然收成的好壞和自然氣候有着一定的關係，但土地明確歸農戶所有等一系列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措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仍不可忽視。同時，中共中央在經濟、勞動等政策上也作出了一系列比較符合實際的決策。軍隊和地方的正規化建設由於中共中央的到來都有了長足的進展。第四次反「圍剿」時，由於對軍隊基本戰鬥技能培訓明顯加強，紅軍將領深切感受到：「射擊技能之不夠在過去成為部隊普遍的現象，而這次戰鬥中射擊技能之進步並成績確有不可抹煞之事實。」^②

中共中央到來後，隨着大批具有相當文化水準人員的陸續進入，中央蘇區的文化教育空前發達。各種雜誌、報紙紛紛創刊，反映着當時中共中央的態度，輿論批評的氣氛尚較活躍，並由此給後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認識中央蘇區的珍貴史料。在肅反問題上，雖然肅反擴大化趨勢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變前後的嚴重肅反錯誤已被糾正，黨內的所謂「殘酷鬥爭」主要體現在思想方面，組織上的措施明顯比此前謹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對象羅明，也沒有遭受肉體上的摧殘。大批幹部的到來也使監督體系和民主決策有了一定的發展。軍隊正規化建設正在加強，幹部的使用更程序化，

① 毛澤東：《才溪鄉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344頁。

② 《大龍坪附近戰鬥詳報》，《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江西黨史資料》第20輯），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印，1991，第126頁。

蘇維埃政權的組織體制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這些，代表着蘇維埃政權軍事、政治上不斷發展的現實和趨勢，中共中央作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應完全抹殺。所以，1944年六屆七中全會決議中明確指出：「自四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其正確的部分，應該進行適當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①這一說法是中肯的。

當然，和毛澤東時代注重實際、認真調查研究、在實踐中艱辛探索從而迅速使蘇區獲得發展壯大相比，毛澤東逐漸淡出決策層後，中央蘇區確實存在着一些嚴重的問題，毛澤東曾談道：「在1927—1935年而特別是1931—1935年時期我黨曾經因為政策過左而陷於孤立，處於極端危險的地位。」^②他所作的更具體解釋是：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機會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左」……把赤白對立絕對化；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片面強調工人利益而把工商業很快搞垮了；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傷了一部分中農的利益。當然，我們黨在農村中還是有群眾的，不能說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實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們沒能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③

① 《楊尚昆回憶錄》，第214頁。

②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第282頁。

③ 毛澤東：《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30頁。

出現這些問題，既有蘇區本身的原因，也有中共中央指導的失誤，既可看作探索中的失誤，也不能忽視理論指導和實踐上的欠缺。畢竟，經過國民黨方面的數次破獲和打擊後，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是一個十分年輕的領導群體，兩位主要領導人秦邦憲、張聞天分別只有24歲、31歲。即使考慮到中共是一個年輕的政黨，秦、張兩人的年齡和經歷仍然顯得太過單薄，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下，完成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確實有些力不從心。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裏並沒有以他個人的政治沉浮作為蘇區政策變化的時點，這應屬客觀的實事求是態度。事實上，面對當時民族危機和政治生存的複雜局勢，中共黨內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不足為奇，而在克服這些問題的道路上，也凝聚着許許多多中共黨人的心血。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王明雖然遠在數千里外的莫斯科，但他當時的動向仍值得特別重視。

2. 新形勢與新任務

1931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針對「日本資產階級報紙關於蔣介石和共產黨人進行談判的傳言」通過決定：「責成東方地區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說明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蔣介石進行談判。」^① 共產國際專門就此一問題作出決定，粗粗看，似只是對既有方針的繼續，細細觀察，卻可發現其背景並不簡單。

①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第185號記錄（1931年10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41頁。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對遠東乃至世界格局都是一個重大挑戰。就蘇俄而言，日本的威脅已經十分現實，盡力防止其北進成為蘇俄重要戰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蘇俄極力防止刺激日本，11月1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與廣田見面時明確表示：「蘇聯政府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中一貫實行嚴格的和平與和平關係的政策。它重視維護和鞏固與日本現存的關係，對各國間的衝突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維護現存的兩國關係，並在自己的行動和命令中應考慮不要破壞蘇聯的利益。」^① 因此，此時中共方面和蔣介石的任何接觸，都有可能導致日本作出國共在蘇俄指導下攜手抗日的判斷，對日蘇關係穩定顯然不利，這是蘇俄方面極力要避免的。

雖然蘇俄不願公開刺激日本，但面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又不能不慎謀應對之策。中蘇兩國出於戰略利益的需要開始明顯表現出接近勢頭。1931年7月初萬寶山事件剛發生時，蘇俄即通過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議恢復邦交，表示：「現今日本覬覦滿蒙，國境方面中日緊張。當此時機，中國政府何不重訂對蘇對日政策，採對俄親善方針而使本國能專心對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國之對日實力必佔優勢，而造福於今日之中國。」^② 對此，南京政府雖屢經討論，終以雙方意識形態差異，拒絕蘇方提議，斷言：「蘇俄對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國。蘇俄狡猾，斷無輕棄侵略野心之可能。」

① 《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頁。

② 《東北政治委員會致蔣介石、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電（1931年7月6日）》，日本外務省記錄A.6.1.0.5，轉見鹿錫俊《1932年中國對蘇復交的決策過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故對莫代表所轉告之各種建議，我絕不許可，並應予以反駁。」^① 9月底，為應對九一八事變成立的國民黨中央特種外交委員會討論了對蘇復交問題，在此問題上開始採取彈性態度，強調：「對俄復交事可進行但不必立刻實行，以保留與歐美交涉之作用並為有條件之交涉。」^② 1932年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決議，決定與蘇俄進行復交的秘密談判。12月12日，中蘇雙方互換照會，宣佈自即日起，中蘇兩國正式恢復正常的外交與領事關係。不久，南京政府任命顏惠慶為駐蘇大使，蘇俄政府派遣鮑格莫洛夫為駐華大使。

蘇俄對南京政府態度的變化，不可能不導致其對中國革命政策的調整。雖然出於對日本反應的顧慮，這種調整進行得小心謹慎，而且在南京政府堅持武力「剿共」的前提下，中共與南京方面的武力對抗之路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但微調的跡象其實已經在逐漸顯露，1931年11月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1945年談道：

在1932—1935年期間……我逐漸對一些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起了些思想上的變化，因而在有些政策問題方面，與當時當權的其他教條主義同志有些原則的分歧，例如在政治上——在1932年春不同意臨時中央對上海十九路軍抗戰是

① 《劉尚清致張學良等電（1931年7月9日）》，日本外務省記錄A.6.1.0.5。

② 《中央政治會議特種外交委員會第1次會議記錄（1931年9月30日）》，劉維開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第6頁。

反動性戰爭的估計，不同意他們反對「工農兵學商聯合」的口號；同年冬，代中央寫了提議在滿洲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致滿洲黨的信；在 1932 年—1933 年長期向米夫說服和鬥爭的結果，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議修改對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左」傾錯誤，並寫了經濟政策一文；1934 年底在新條件與新策略等文中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 年代中央起草八一宣言及寫《新形勢與新政策》一文等。在組織上——不同意臨時中央在白區亂用「右傾機會主義」大帽子，亂打黨和團的許多地方組織和幹部；不同意臨時中央在蘇區反「羅明路線」，反毛主席及其他同志的鬥爭等。^①

1945 年當時，王明正處於被痛打的落水狗地位，他的這些表態沒有得到多少重視。撇開王明這段話自我表功的成分，可以看出，王明實際上道出了蘇俄和共產國際新形勢下調整中國革命政策的過程。

1932 年 9 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 12 次全會上，王明發言提到了民族革命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問題，但論者一般以為這還是此前中共已經提出的下層統一戰線的翻版。不過，到 1933 年 1 月，隨着他先後起草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及《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及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的發表、發出，

^① 《王明致任弼時並轉毛澤東信（1945 年 4 月 20 日）》。

表明王明的思想確實已在發生不應忽略的變化。前一宣言表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願在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創立義勇軍以保衛國家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①這一表態區別於此前中共「要兵不要官」的兵運政策，開始突破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後一指示信則明確提出：「我們總策略方針，是一方面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境）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另一方面準備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及統一戰線內部階級鬥爭的基礎，準備滿洲蘇維埃革命勝利的前途。」信中強調在執行反日統一戰線策略時應高度注意：

堅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即無產階級的政黨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評和揭穿統一戰線內團體中的一切不澈底，動搖，叛變，變節，投降的企圖和事實。堅決的無情的反對右傾分子把奪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策略，變為投降和作資產階級尾巴的一種企圖和趨勢。但同時要和「左」傾關門主義，及在政策的實際工作中想跳過現在階段的企圖和趨勢宣佈無情的戰爭，因為這可過早的破壞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現在所規定的必須的統一戰線。並且這在客觀上實際是

①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紅色中華》第48期，1933年1月28日。

幫助日本帝國主義。^①

同月，王明發表《東三省情形與抗日統一戰線策略》一文，重複了指示信的基本內容，同時批評：「中國共產黨底東三省組織，犯了許多策略上的錯誤。東三省組織不懂得和不善於實行反日的統一戰線的策略。」^②

1933年11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3次會議上，王明發表講演，就蘇維埃建設和軍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觀點。對於中共正在面對的第五次「圍剿」，王明強調，中共中央正在執行的軍事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

反對那種「左」的冒險的傾向，其具體表現，就是完全否認有暫時地部分地軍事策略上的退卻底可能和必要（例如，為避免和敵人過大力量底作戰；或者為的抽出時間準備和找到好的機會再作進攻等等），就是對於保存紅軍實力有第一等意義這一點估計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機械地了解鞏固根據地任務，甚至以為可以犧牲大量紅軍力量去達到這一目的。^③

對於蘇區的經濟政策，王明肯定：「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了專門關於合作社條例（譬如在中央蘇區在這一個時期中就成立了五百

① 上海中央局：《鬥爭》第44期，1933年6月10日。

② 《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中國出版社，1938，第306頁。

③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底任務》，《王明言論選輯》，人民出版社，1982，第362頁。

個以上的生產、消費和信用合作社)；關於國家和私人的借貸條例；關於允許在蘇區工商業投資條例；關於徵求專門人材啟事；關於工人監督生產和在蘇維埃監督之下允許土地買賣的條例；以及關於禁止不斷平分土地的指令。」^① 同時他批評：「許多黨和蘇維埃組織對於在中農當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夠，而且有時候對中農的關係不正確（首先就是左傾幼稚的態度）。」^② 這些，或者是中共中央已經採取的，或者是王明希望中共中央做到的，其核心內容都體現着糾正此前過激方針的思路。

王明講演中有一段話特別引人注目：「在黨和群眾組織當中，有許多同志對於黨的任務底了解和執行，時常是一成不變地、瑣碎地、教條式地，時常是不曾估計具體的主觀和客觀的條件，不曾在新的條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黨應當在這個問題方面，起一個根本的轉變。」^③ 王明在此要求不能教條地、一成不變地對待黨的任務，而應根據主客觀實際，在新條件下採用新方法。頗具意味的是，正是王明，日後被作為是這一時期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王明這個名字，在許多人心目中，幾乎成了教條主義的代名詞。

當然，王明強調應拋棄教條的態度並不等於他本人就不教條，評判歷史人物，更應該注意的不是其原則闡述，而是其實際作為。就此看，這一階段，王明確實表現出了比較理性的態度。1933年

①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底任務》，《王明言論選輯》，第325頁。

② 同上書，第364頁。

③ 同上書，第371頁。